

浙东学派的学术谱系建构及其路径选择

梅新林 俞樟华 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深刻的史识与坚实的文献同等重要，前者通过后者印证才更加可靠，而后者则可以引发前者的深化与飞跃。编年史之不同于一般的编年，更不同于个体的学者年谱，即在于它旨在寻求两者的密切互动与交融中推进学术创新。

浙东学派是一个以浙东区域命名而又超越区域、深刻影响海外与当代学术研究的著名学术流派，其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因时而变、与时俱进的创新机制，兼容并蓄、历久弥新的生命活力，不仅在漫长的发展演变历程中结出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而且在持续影响当今文化价值体系的重建中不断释放出巨大的精神能量。然而，就学界的研究现状而言，与浙东学派的地位和贡献并不相称，其症结在于长期以来学界对浙东学派基础研究工程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比如对浙东学派相关文献的整理，对浙东学派内在学脉的梳理，都还存在着诸多缺陷，因而也就谈不上从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高度，通过对浙东学派发展演变历程的还原，最终完成对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系统建构。因此，我们认为不仅需要确立建构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宏远目标，而且需要具体选择编纂《浙东学派编年史》作为重点突破方向。

渊源追溯与阶段划分

浙东学派的传承漫长、多元、曲折、复杂，真正要做到梳而理之、贯为通之，的确并非一件易事。对此，前人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渊源追溯与阶段划分。比如何炳松在著于1932年的《浙东学派溯源》一书中，首次将浙东学派分为前后两期：“第一期自南宋至明初，第二期自明末到现在。第一期有永嘉、金华两大派，并由金华分出四明的一支；第二期中兴于绍兴，而分为宁波与绍兴两派。”

而目前学界有关浙东学派发展阶段的划分，当首推张刚雁提出的“四阶段”之说：(1)北宋。以“明州杨杜五子”与“永嘉九先生”为主要代表，是为浙东学术的草昧时期。(2)南宋。已经形成浙东诸学派，主要有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及传授陆九渊心学、以“甬上四先生”为代表的四明学派。(3)明代。以阳明心学的兴起为主要内容，其后又有“浙中王门”和蕺山学派。(4)清代。主要代表有一代大儒黄宗羲、明史专家万斯同、文献学大师全祖望、史论大家章学诚、史学专家邵晋涵等，是为浙东学术的全盛时期。

总结浙东学派学术精神传承

吴光《试论“浙学”的基本精神》归纳为：求实精神、批判精神、兼容精神、创新精神。钱茂伟《浙东学术史话》归纳为：经世、务实、救偏、兼容、求真。杨太辛《浙东学派的涵义及浙东学术精神》归纳为：平彰学术，考镜源流；学有宗旨，不守门户；实学求是，经世致用；应实相生，崇尚性情；严于去伪，慎于治偏；砥砺气节，躬行实践。

此外，也有不少学者重在对明清时期浙东学派学术精神的探讨与总结，如陈祖武《明清时期浙东学术的历史地位》归纳为：实事求是、学以经世的为学精神；转移风气、领异立新的学术品格；兼容并蓄、历久弥新的强大生命力。冯俊《浙东学派的基本精神及其当代价值》归纳为：实事求是和反对空谈的精神；以民为本和政治革新的精神；经世致用和注重事功的精神；立足现实和史学经世的精神。

在史识与文献的互动中建构

以上两方面的工作，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也充分展示了相应的学术深度。但从

建构一个富创意、集成性的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宏远目标，以及需要史识与文献双重支撑的更高层次要求来衡量，这些学术归纳与结论普遍未能建立在更为扎实的编年基础之上，也未能进而将史识融汇于编年之中，熔铸集成性的编年史之作。

刘志琴曾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总序《青史有待垦天荒》中提出“借助编年，走进历史场景”的学术理念，颇有启示意义。《浙东学派编年史》体例与功能的优长之处，在于能最大限度地帮助我们走进时空合一的“历史场景”，并从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高度完成对浙东学派学脉传承的历史还原与重建。

台湾学者陈训慈谓“清代浙东之学，近承姚江性命之教，而远绍两宋儒哲之传，两宋三百年之间，大儒蔚起，浙东学者与中原相望，而永嘉、金华、宁波三处之学风为尤盛”。这是由清代浙东学派通过“近承”上溯于明代的王学，又通过“远绍”上溯于宋代的永嘉、金华、宁波之学，但究竟是如何“近承”，又如何“远绍”的？比较而言，“远绍”的学脉梳理和贯通当比“近承”更难。

杨太辛则由源观流，谓“自南宋至明清的浙东学术，名家辈出，各有所得。细按之，分源别派，或以地望名，如金华、永康、永嘉、会稽、四明；或以师承称，如吕学、王学。概言之，曰浙东学派。浙东学术是否可概称为浙东学派，赞成者言之凿凿，反对者诤诤有词，这些且按下不表。但由于地域、师承、学风、时代的综合影响，浙东学术，无论其为金华、永嘉，还是会稽、四明，不管其宗程朱，还是宗陆王，大致有一种共同的精神，故名之曰浙东学术精神”。所谓“浙东学术精神”，的确广泛涉及地域、时代、师承、学风等诸多问题，如何由现象回归本原，由偶然走向必然？在此，深刻的史识与坚实的文献同等重要，前者通过后者印证才更加可靠，而后者则可以引发前者的深化与飞跃。编年史之不同于一般的编年，更不同于个体的学者年谱，即在于它旨在寻求两者的密切互动与交融中推进学术创新。

关注直接关系学术谱系的问题

就《浙东学派编年史》对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建构而言，则需要在史识与文献的互动交融过程中，重点关注和解决直接关系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内蕴与外化的关系。主要涉及浙东学派学术谱系渊源的本土孕育与外来涵化的问题。南北宋之交，浙东以及整个江南经历了从文化边缘到文化中心的重大变化，浙东学派在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与异趋的双重选择中，由其固有的“边缘活力”逐步累积而成因时而变、与时俱进、勇于怀疑、善于创新、追求独立与卓越的本土文化精神，并在“边缘—中心”的重大跨越与前行中不断得以发扬光大，以此深厚内蕴广泛吸纳外来文化，最终内化为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流与多元的关系。主要涉及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结构的主流引领与多元共存问题。浙东学派对儒道佛三教合一以及儒家内圣与外王的选择，往往因时、因地、因人有所不同，但始终一以贯之的是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在此主导下，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结构的多元共存，同时呈现于浙东区域的本土亚文化以及本土与外来文化之间。这种主导性与多元性和谐共存局面的形成与延续，与浙东学派开放包容的精神是互为因果的。

传统与新变的关系。主要涉及浙东学派学术谱系演进的历史承继与因时变革的问题。古人云“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浙东学派之所以拥有如此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生命活力，即在于该学派既以一以贯之的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为主导，同时又能直面不同的时代课题，因时而变、与时俱进。上引学者所作的概括——经世、务实、救偏、兼容、求真；求实精神、批判精神、兼容精神、创新精神等等，都是对浙东学派因时而变、与时俱进的变革创新精神的精辟提炼和阐发。

近承与远绍的关系。主要涉及浙东学派学术谱系传承的直接师承与学统认同的问题。学术谱系的传承首先是通过一代又一代的直接师承而依次向前延续的，这是一种“实在”的传承关系，通常容易把握。对浙东学派而言，除了应该充分关注这一“近承”关系之外，还有“远绍”的问题，这是一种超越直接师承关系、出于同代甚至不同时代之间的学统认同，是一种“虚拟”的传承关系，需要细加辨析。只有近承与远绍相互并观，才能从虚、实两个方面完整而又辩证地把握

浙东学派的学脉传承。

原典与播迁的关系。主要涉及浙东学派学术谱系资源的原创动力与播迁效能的问题。原典是指作为学术文化源头的经典要籍、思想、精神等，是一种未经修饰、诠释、解读的最本源的经典与学说。但对某一学派而言，原典与经典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从宋到清，浙东学派不仅一直保持着不断催生学术经典的强劲动力和活力，而且许多经典要籍也在历经风雨沧桑洗礼之后而转化和升华为原典之作。其在不同时空中的播迁效能——从古到今、从中到外的持续影响力，反过来也是对发自谱系本原的原典与经典生命力的综合检验。